

教育前沿

新时代教育理论创新从何而来

李政涛 叶澜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教育界历经4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经创生积累了丰富且独特的中国经验,生成了中国格局,在世界教育改革的画卷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育实践变革从来离不开理论的介入和引领,两者一直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相伴相随。然而,与实践领域经验增长日新月异甚至突飞猛进相比,教育理论的增长却相对乏力。至少从教育研究界的中国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国实践,而非中国理论。这不仅反映了关注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现状。虽然,我们不能要求二者必然同步更新,但如果能相向而行,进而共生共长,对双方都会大有裨益。

实践研究必须有理论,且理论研究要适度先行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3月6日下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谈到教育时指出,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考察时他又强调了这一重要论述。这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理论界研究的殷切期待。

总之,一个召唤教育理论创新、彰显教育理论创新、推进教育理论创新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需要教育理论创新为之赋予理论的深度与高度,用理论的远见去引领实践的未见,去洞察和照亮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27年来,我们所从事的新基础教育,这一基础教育改革研究证明,实践研究必须要有理论,且理论研究要适度先行。

理论适度领先首先在改革的起点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针对时代变革与教育变革性质及内容的研究;另一方面表现为针对当代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对当前的教育需要在观念和行动上做出怎样变革的深度探讨。在此过程中,教育观念与理论本身先需要变革,成为教育实践变革的先导,它产生于对现实社会发展变化性质的深度感受,对未来社会需要怎样教育的理解,对教育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的透视,以及由此而生的教育中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形成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新观念。在教育理论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已然明晰的情况下,我们以为,尚需深究三大关键性问题。

第一大关键性问题,如何进行理论创新

首先,明确提出并回答“什么理论最有价值”这一前提性问题。

这涉及教育理论创新的方向与重心,把理论创新的重心放在最有价值

的理论。由此回到了一个具有原点意义的问题:什么是好的理论?判断理论好与不好,价值高低的标准何在?就教育理论的对象和性质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标准或尺度之一。就此来看,我们认为,能够对教育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就是有价值的理论。那么,怎样的教育理论才能对教育变革实践产生影响力?基于27年新基础教育变革的经验,我们发现,好的教育理论常常是具有反思与批判针对性的理论,具有未来指向、内在开放性的理论,具有综合抽象、层级转化结构的理论,具有边界与尺度的理论以及见真、见知、见诚,有温度的理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有价值的教育理论,应该是抽象程度高的理论,理论的抽象程度越高(只要是对实践的正确抽象),对教育实践就越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相反,越是具体经验型的描述,其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就越小,程度也越浅。从这个角度看,抽象程度高的教育基本理论,对于教育实践变革的影响往往更为根本,也更为持久和深远。因此,新时代的教育理论创新,要特别重视教育基本理论的更新与重建,在这个层面上的理论创新,是教育变革最艰难,也最重要的理论创新。

其次,扭转教育理论创新过程中的传统观念与思维。

教育理论创新过程中的传统观念与思维,有时如同横亘在创新之路上的路障,只有及时移除,才可能建成通往教育理论创新的平坦大道。

这些路障都与习惯性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关。一是轻视。在教育改革中,习惯于凭经验、重实操,轻视甚至无视教育理论的价值,没有真正认识到教育理论之于教育实践的根基性、引领性价值。二是演绎。忽略教育理论,尤其是教育改革理论的特殊性质,习惯性地把社会变革或经济变革理论简单演绎到教育改革之中。没有意识到,理论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之间的理论不能相互推演,而应基于实践活动和方式的特殊性,运用或生成不同的理论。这说明,在教育理论创新过程中,任何社会变革理论,包括经济变革理论、政治变革理论等,都不能以简单演绎的方式,更不能以简单替代的方式,直接变为教育改革的理论。三是单向。总是对教育理论如何转化为具体实践行为、心念,却在如何把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教育理论上少知少觉。后者才是新时代教育理论创新最需要进入的盲区和填补的空白。

再其次,建构通向教育理论创新的主要路径。

它具体回答的是教育理论创新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方面,大多数研究已经在文化传统、时代精神、实践根基、国际视野等方面逐步达成了共识。当下最急需的是建立一套系列化机制,把这些基本路径整合建构为行之有效的转化机制,它以交互



视觉中国 供图

生成为目标与特征,以如何把文化传统、时代精神、实践根基与国际视野转化为教育理论创新的具体方式和策略为抓手和载体。

在我们看来,无论哪条路径,无论什么样的转化机制,都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着新时代中国教育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育人方式改革、公平与质量的关系等展开,在解决重大问题中汲取多方资源,采用多种路径,进而实现理论意义上的推陈出新。

第二大关键性问题,谁来进行教育理论创新

在以往,毫无疑问,教育理论工作者被视为理论创新当仁不让的主体,这也被教育实践工作者所认同。但与此同时,又带来两种根深蒂固的成见:一方面,教育实践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只是行动,只要照着领导的指示或者理论工作者的设计行动即可,似乎他们的工作范围被限定于所谓“实操”。事实恰恰相反,教育实践家们不仅要行动,而且要掌握基本的教育理论,有自己的教育信念,更要研究教育行动的理论与哲学。这是与教育理论家的研究领域很不相同的领域,却是教育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也是走向成熟、专家型教师最关键的一步。另一方面,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么只是教育理论发展的跟从者与践行者,要么被限定为教育理论发展资源的提供者与输出者。实际上,教育实践工作者同样可以成为教育理论生产的介入者与改变者,成为教育理论创新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最终成为教育理论的创新者或创造者。为此,如何提高实践者的理论创新自信、理论创新自觉,进而赋予其理论创新的能力,也是新时代推动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除此之外,在教育理论外部,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参与和介入,也是必不可少的创新力量。之前,也有部分人以各种方式卷入了教育理论创新发展的进程,但往往是被动式卷入、拼盘式加入,这构成了未来教育理论创新另一有待着重破解的瓶颈难题:如何激发相关学科理论研究者的内在需要,使其主动加入教育理论创新的共同体,形成只有通过跨学科和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才可能形成的新思想与

新理论。

以上两大主体的加入意味着,教育理论创新是一个共同创生的过程,它必须依托一个多元主体主动加盟的共同体来推进。这个共同体的使命和宗旨,就是一起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创造新的教育理论。对每个共同体成员来讲,都有必要主动地参与这个过程,都需要不断地反思,都需要投入和重建。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在于,共同参与变革实践,形成共生经验,这是理论实践实现双向转化和渗透,进而实现教育理论创新的基本保证。共同体的每一类主体,都要学会相互尊重与倾听,在碰撞与交流中逐渐达成共识,要保持对自身缺失的敏感、学习、体验与完善,更要共同反思、总结、交流、分享,这样一来,创生的新经验与新理论才能实现彼此交融、共生共长,最终共同长出“新理论”。

第三大关键性问题,如何培育适宜教育理论创新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的实质,就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学术文化土壤,它的厚度和深度,影响甚至决定了教育理论创新的力度与高度。这里的生态环境,包括内环境和外环境。

所谓内环境,既指教育理论创新共同体的内部环境,也指教育理论创新主体的心态或心境。只有破除浮躁无根和自卑抱怨的心态,大力倡导自信与坚定、务实与扎实、沉静与深耕的学风,才可能生成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所谓外环境,表面上是社会舆论、社会风气,全社会都要为此大兴理论创新之风,根本上则是社会评价导向,尤其是评价导向和评价机制。如何通过“破五唯”,努力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扎根中国大地推进教育理论创新”等价值导向,转化为评价机制,把理论创新度作为重要的价值尺度等,是营造与培育适宜教育理论创新生态的又一关键所在。

(李政涛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叶澜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

“入主流”是清华大学的办学格局。大学的格局非常精准地约束和规定了大学的办学方向。可以说,“入主流”在世纪的交接之处,拓展和深化了清华大学爱国奉献精神品格的精髓。

走过110年历史的清华大学,沉淀了拥有自身个性和特色且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品格在历史中淬炼,也在时代发展中升华。透过谢维和等新著《清华的风格》一书,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拥有深厚学术文化积淀的百年清华,一直以其永无止境的探索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清华大学深刻地参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百年清华无论是在什么历史环境中,都始终将爱国奉献作为自身教育发展的核心精神。在《清华的风格》的描述中,我们看到,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体现出“无问西东”的高尚品格,抗日战争时期以张甲洲、李松霄、姚显微、杨学诚等为代表的抗日烈士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清华大学毕业生青春无悔、奉献边疆,追溯源头,这些现象与清华诞生于危难之际相关,与庚子赔款有关,也就是《清华的风格》中所指出的一种耻感,这是理解清华人骨子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繁荣昌盛之重要性的基本线索。

爱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还体现在清华入主流的办学格局上。《清华的风格》着重讲述了作者所熟悉的清华大学在20世纪末恢复文科的教育改革实践。作者认为:“入主流”是大学的办学格局。大学的格局非常精准地约束和规定了大学的办学方向。可以说,入主流在世纪的交接之处,拓展和深化了清华大学爱国奉献精神品格的精髓。

清华大学虽然以留美预备学校起步,但是终究发展出融汇中西的学术之路。《清华的风格》明确论述了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和文理之争的思想语境中清华大学所形成的教育道路:事实证明,清华大学做出了十分得体的响应,由此开创了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并且对整个中国的大学提供了示范。在西风烈烈的时代,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以四大导师为代表的学者,积极探索建立现代学术的中国话语,用现代学术语言深入地梳理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现象。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冯友兰致力于建立中国哲学史的话语体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费孝通在导师吴文藻影响下聚焦于社会学的中国化,从早年的“江村研究”到乡土中国,再到富民思想,直至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可以说费孝通是百年清华文化自信精神品格的典型代表,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此外,文化自信的精神品格还体现在清华大学对育人的理解上。清华大学除了专业教育培养之外,还特别注意学生艺术和体育素质的培养。《清华的风格》一书讲述了清华大学学生在本科时代无不受受到浓厚的艺术氛围的熏陶。马约翰的体育故事、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奋斗口号和“无体育,不清华”的直接告白,都体现了清华大学在育人上对于综合素质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正是坚持文化自信,清华大学才能不容易守旧或者趋新,在百年的

百年清华的精神品格

张耀宗

发展中显示出博大深邃的品格。

在百年清华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追求卓越首先体现在能有大师,更能培养大师。《清华的品格》认为,清华大学在历史上培养过叶企孙、邓稼先、钱学森、杨振宁和季羡林等这样的大师。新世纪以来,从“生比”的提升,到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再到致理书院、未央书院、探微书院、行健书院成立,清华大学在立足学生个性化发展、培养大师和杰出人才上不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改革探索。这些从招生到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实践,随着时代变化,为清华大学不断培养大师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追求卓越还体现在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精益求精上。一方面,从建校以来逐渐形成的立足国家需求到当下的攻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说明了清华大学的精益求精,这个新与国家紧密关联、与新时代共前进。这使得清华大学始终站在时代学术的前沿,对前沿学术作出前瞻性和实践性回应。其间必然会呼唤大师、培养出大师。另一方面,精益求精还包括围绕产学研的一系列改革创新。《清华的风格》指出,清华大学在新时代已经探索出一条新的产学研系统:清华大学的科研体制及其与企业的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校内校外相结合、国内国外相衔接、大学企业相合作、不同文化相融合的生态系统。这样的高等教育创新实践为追求卓越在新时代的独体内涵注入了清华智慧和清华风格。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复兴史的一个部分,它的精神品格也汇聚成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一部分。《清华的风格》不仅突破了一般的教育史写法,而且注重理论总结,对百年清华的精神印记进行了精当的提炼与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10年来,清华大学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培育了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了大批可堪大任的杰出英才。《清华的风格》以丰富的校史材料和深入浅出的叙述,对这一深刻论述作出了生动的呼应。

(作者单位系南京晓庄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时代新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表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的崇高使命和光荣职责。浙江中医药大学始终坚守“学生为本,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传承“求本远志”的校训精神,坚持以立德树人为立身之本,以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为己任,以理论引领、实践养成、文化熏陶、组织建设为抓手和重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成育人之本、兴校之基、办学之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书写了一篇篇“大医精诚、锐意创新”的时代华章。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立德以端品行,立德以铸国魂,立德以正医规。践行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学校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5个,浙江省十三大优势专业、特色专业14个,国家精品课程11门,国家级教学团队一支,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等一批教学平

台,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项,两次获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中医学、临床医学、中药学3个专业通过专业认证。2017年,学校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学生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不断提高,近些年毕业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课程思政 正面育人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育人全过程,浙江中医药大学主动创新思政教育工作,精准把握师生思想动态,融合思政课程主阵地、专业教育主渠道、校园文化主路径,形成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为保证课程思政有效实施,学校组织精锐师资开展教学大纲撰写、教学案例整理、教学文案设计等工作,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在传授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润物无声地将道德品格、理想信念等思政德育元素渗透到专业课程中。结合医学院校特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医学学生的职业

校园文化 隐性育人

浙江中医药大学地处浙江,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学校依托“三地”文化资源优势,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突出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学校发挥中医中药特色优势,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在葡萄牙科孔子学院、南非西开普大学建立孔子学院,积极推进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建中医药文化研究院、创“浙派中医”文化品牌、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推动中医药文化进课堂进校园,如开设系列中

医药文化课程,开展太极拳、五禽戏等传统保健运动等,让每名大学生都得到中医药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从而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

学校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定期开展思想动态分析研判,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事项流程图,细化教师授课纪律和规矩,加强课堂、讲座、网络等宣传思想阵地的建设与管理,做大做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实践工作。

网络媒体 线上育人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具有快捷、高效、及时等优势,这也成为青年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浙江中医药大学利用网络媒体的多种优势,快速提升新媒体的运用能力,发挥网络媒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有利作用,抢占这一前沿阵地。学校建立浙江中医药大学知识管理平

台,在此平台中设立了课程中心(汇集了全校的网络课程、视频公开课、微课、公选课通识课等课程)、资源中心(包含中医药大学以及其他国内外的优秀学习资源,供全校学生和教师选用)以及服务中心(整合了平台服务和网络课程申请、视频课程录制、教室管理、工作联系单等多方面内容)。

与此同时,浙江中医药大学紧抓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建设,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为主,激活正能量,充分挖掘学生、教师中优秀的个体和团体,将他们中努力学习、拼搏进取、感人至深的典型事迹传播出去,不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正能量。在学生关注热点的同时,对

